

# 亚洲基建投资格局背后的中日经济博弈与制衡

张艾莲 刘 柏

**内容提要:** 2014年21个创始成员国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时隔几个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成立亚洲基建基金。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中日再次形成竞争博弈。两大机构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如果日本希望单纯依靠资金竞争,将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反而会步入狭窄空间。作为亚洲经济大国,中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优势能够产生数倍于独自行动的功效。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多方投资格局意味着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网络形成了有效的牵制,这种制衡将在国际层面避免一国优势的垄断,同时有利于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亚洲格局。

**关键词:**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 亚洲基建基金 经济博弈 经济制衡

**作者简介:** 张艾莲,吉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刘柏,吉林大学商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F8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874(2015)04-0093-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民币双边波动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与协调研究”(编号:15BJY156),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领袖培育计划“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编号:2015FRLX16)。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倡议。2014年10月,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截至2015年4月,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涵盖了除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发达国家。亚投行的目标直击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薄弱环节——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因为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普遍瓶颈。

作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对以美国和日本为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造成冲击，并动摇了日本在亚洲的金融地位，甚至会由此改变亚洲地区的区域组织格局。因此，2015 年 5 月 21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亚洲未来”国际交流会上发表演讲时宣布，日本将在今后的五年内提供约 1100 亿美元资金成立亚洲基建基金，用以支持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安倍还表示，日本将主要通过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政府系统内的“国际协力银行”、“国际协力机构”三条渠道向亚洲国家提供资金的支持，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sup>①</sup>虽然安倍晋三强调亚洲基建基金提供的是高质量项目，主要依靠日本具有长期实践经验的节能技术和公共交通系统，但是这一明显针对亚投行的举措意味着中日两国在亚洲基建领域中存在博弈和制衡，两国在进行国际决策时都将考虑对方的行为，并据此基于自身的利益进行相应的规划和实施。虽然亚洲基建投资的需求巨大，但是这种需求是潜在存在的，需要资金的激励才能实际产生，这种资金的带动性使得资金提供者能够对接受投资国产生重要影响，并实现地区主导影响。因此，为了保持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中日在基建领域必然存在竞争。同时，中日之间的经济往来牵制了两国各自的行为，在亚洲地区形成制约和平衡，避免了单方强权。道格拉斯·莱姆基（Douglas Lemke）认为，区域强权国家对于区域而言具有重要性和主动性，同时具有监督功能，能够对邻近国家产生影响。<sup>②</sup>作为亚洲地区的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博弈，将决定亚洲格局的变动和重塑。

本文将主要从博弈和制衡两方面来解读中国和日本在亚洲基建投资领域的竞争态势。“博弈”最初是运筹学中的概念，但是近几十年普遍应用于刻画国际关系，反映不同国家为了获得对自身最有利的收益，根据一定的规则，动态地相互影响过程。在国家权力的相互竞争中，这种动态关系体现为制衡，因为在国际社会中具有权力优势会为国家带来超额收益，为了抵消和抵抗其他国家权力扩张过快和影响过大，一国通常会采取相应的政策或措施以对抗其他国家的权力影响，由此形成制衡状态。这种权力制衡在国际社会中是必然存在的状态。在相互博弈过程中，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对制衡的战略导向和措施偏好不少是相异的，采取的行为或会被其他国家作为战略制定的考虑因素。

① 参见乐绍延：《日增资亚洲基建市场有何玄机》，《经济参考报》2015 年 5 月 27 日。

② Douglas Lemke, “Dimension of Hard Power: Regional Leadership and Material Capabilities”,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first Regional Powers Network Conference, September 2008, p. 6.

在亚洲地区，中国和日本无疑分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重要代表。中日之间的竞争关系历史久远，涉及层面众多。这里的“竞争”，主要突出表现为两者的相互关系，集中体现在中日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上。而基建“竞争”的形式，具体可以通过“博弈”和“制衡”两方面进行解读。“博弈”偏重的是两国之间的利益决策，相关金融制度安排的目的，不仅是简单的财务成本收益来衡量，还有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获得优势是根本。“制衡”则侧重针对两国所处的亚洲市场，两极金融格局的形成将弱化地区强权风险，促使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等发挥重要作用，平衡发展是核心。所以，在博弈下的制约和在制衡下的牵制，会让中日两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层面开创新的竞争格局。

## 一 中国和日本形成基建投资竞争的背景

亚洲区域格局的主导国家与经济地位直接相关。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首要的利益是生存和安全，其次是经济利益。任何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行为，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其中，经济因素是基础，不仅能够维持国内发展，而且能够提升国际综合竞争实力，军事等要素的实力提升也依赖于经济资金的支持。在国际体系中，各国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生产的扩大，促使相互交易和依赖程度不断深化，由此产生的跨国议题已经不再是单一主权国家能够独立解决的，需要专门的国际组织提供平台进行管理。在这种框架下，主导国家成为国际取向的关键，中日两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将决定亚洲格局的发展。

### （一）亚洲主导国家的转变

在区域发挥主导影响力，仅仅拥有经济实力是不足的，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制度和体系是在国际社会获得利益的有力保障。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推进的商品交易扩张过程中，现实主义强调避免由于相互过度依赖而使自身受到牵制，应该主导国际协定向国家自身倾斜，并实现国家利益。<sup>①</sup> 约翰·G. 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也指出，国家的崛起与制度战略密切相关，美国在通过制度对战略伙伴实施权力以稳固霸权体系这方面是较为成功的，通过制度约束使得其他国家与其合作并受其影响，因此，美国能够将规则和制度

<sup>①</sup> 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S. Baratz, "Two Faces of Pow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6, 1962, p. 948.

嵌入国际体系中并延续自身的国际权力。<sup>①</sup>但是，二战后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越来越体现不稳定和不公平等桎梏。要突破现有的体系束缚并实现自我利益，就需要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的组织架构。中国建立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亚投行，就是希望借助国际组织的制度化设定，来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

由于国际社会上欧美对亚洲造成的竞争压力，以及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亚洲地区国家亟须进行经济整合，只有形成有效的整体合力才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随着亚洲国家之间经济持续融合和交叉，关税不断减免且限制措施放松，自由化程度日益增强，区域整合程度不断强化。区域融合需要通过平等的合作和对话平台在为亚洲各国提供贸易利益的同时，强化各国密切联系并有效规范各国行为。平台的建立和区域的发展，需要有核心力量或者说领导者来拉动，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以美国为核心，欧盟主要以英法德为中心。亚洲地区由于地域广阔且国家类型复杂，整合受到来自多方势力要素的影响。

历史上，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美国曾经是最大的领导势力，但是冷战结束后，苏联的解体以及经济负担的加重，使得美国逐步减少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并渐进调整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战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所提倡的亚太经济合作在亚太经合组织议程中已不复存在，亚洲各国融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之间签署的贸易协定。日本在二战后借助于美国的扶持以及国内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迅速发展并快速占领了东亚市场，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和美国共同占据最大的持股比例。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已经成为区域内具有主导性的经济强国。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学者赤松要就提出了“雁行理论”，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产业结构相异，日本处于雁头的位置，领导处于雁身至雁尾的新兴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亚洲地区的生产结构呈现阶梯性递进。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亚洲格局的变迁，日本开始承认“雁行理论”已不再适用。2001 年 5 月日本政府发表的《贸易白皮书》中，首次承认了日本充当经济发展“领头雁”的亚洲“雁阵”产业分工体系已经逐渐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极速成长的中国经济。<sup>②</sup>

<sup>①</sup>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U. 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

<sup>②</sup> 参见杨义瑞：《日本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立场浅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5 期。

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由于主导行为者的身份改变而对相互行为产生影响。而一国要成为主导者，与其经济实力的提升密切相关。中国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实力提高，促使其身份认知改变，进而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结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话语权和重要性凸显。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日本的经济低迷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中国通过对外经济贸易与其他国家形成有效合作，提升了生产、管理和科技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也不断提高，成为具有政治领导力的国际大国。戴维·康（David Kang）认为中国的振兴不能称为“崛起”，而是“中国再起”，这是中国的重新崛起。一旦中国在亚洲地区崛起壮大，其他国家将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层次性结构，这不仅有利于稳定，而且将减少冲突。<sup>①</sup> 还有很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周边国家重新调整与中国的关系，甚至是扈从于中国。<sup>②</sup> 但是，阿米塔夫·阿查里雅（Amitav Acharya）等并不认同戴维·康的历史决定论。<sup>③</sup>

## （二）中国和日本在基建投资领域的竞争格局

经济增长是一国持久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增长将不会有发展。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就是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和质量取决于投资的规模 and 效益。基础设施投资是国家投资的核心一环，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不是短期显现，而是具有长期效应且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近些年，中国和日本在不同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其中东南亚地区是主要争夺目标地区。2010 年，东盟通过了近 300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预计于 2020 年完成。巨大的需求吸引着包括中日的众多国家。以高速铁路领域为例。近些年东南亚高铁线路的建设和延伸吸引了在高铁技术研发和建设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的中日两国，中国和日本都希望建立由自身主导和倡导的高铁布局，并提升影响力。但是，由于东南亚地区政治的复杂性和经济的不平衡性，导致计划实施推进缓慢。中日在高铁方面

<sup>①</sup>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up>②</sup> Womack Brantly,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symmetry, Leadership and Normalcy", *Pacific Affairs*, Vol. 76, 2003/2004, pp. 529-48. Shambaugh David,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2004/2005, pp. 64-99.

<sup>③</sup>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2007, pp. 287-312.

的技术和资金竞争日趋激烈，其中一个重要的争夺点就是泰国的高铁项目。

提升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是中国实施泛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的建立和便利成为扩大影响力的关键前提，由于越南和缅甸等国复杂的政治因素影响，泰国成为中国扩大经济圈并形成泛亚铁路网的首要选择。但是，泰国并未完全依赖于中国，依然寻求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合作伙伴。在泰国资金缺乏的条件下，接受贷款意味着将与提供贷款的国家实现建设项目的深入合作。中国出于从中国延伸至新加坡的铁路轨道建设需要的考虑，日本则鉴于希望维持在东南亚影响的初衷，两国都向泰国表达了愿意提供资金贷款和技术支持的意愿。经过不断的比较和衡量，2015 年 3 月，泰国运输部透露消息表示，中国提供的贷款利率在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 2%，在铁路系统运营管理方面为 4%，而日本计划使用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 ODA）资金向泰国提供低息的建设资金，利率仅为 1%，远低于中国提供的利率标准，所以泰国政府计划放弃中国贷款。实际上，早在 2012 年中国和泰国就曾提出“大米换高铁”计划以建设高铁，但是泰国政局的变化导致计划搁浅。2014 年 12 月，中国和泰国又签署了《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虽然中间也有消息说计划被泰国取消，但是泰国政府发言人曾确认 2015 年将动工建设。2015 年 5 月 27 日泰国和日本签署了有关铁路合作备忘录，表示将就修建曼谷—清迈的全长 660 公里的高速铁路展开前期调查，并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sup>①</sup>由此可见，在中国与泰国高铁建设合作上的变数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日本的竞争压力。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泰国，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中国和日本都有高铁建设项目意向，同样存在竞争。

非洲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滞后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严重缺乏。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到 2025 年，非洲基础设施的投资预计将达到每年 1800 亿美元。<sup>②</sup>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在机会，吸引着众多国家的投资，中国表现尤为突出。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历史已久，仅就交通基础设施而言，中国在非洲已修建了 2233 公里铁路和 3530 公里公路。<sup>③</sup>2014 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非洲期间又提出了中非合作建设非洲铁路、公路、区

① 参见李颖：《中泰铁路合作还有戏吗》，《文汇报》2015 年 6 月 5 日。

② 参见 Niyi Aderibigbe、秦金月译：《非洲基础设施对国内外投资者富有吸引力》，《非洲商业观察》2014 年 12 月 26 日。

③ 参见《基建合作夯实中非传统友谊》，中央政府门户网，2015 年 3 月 18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3/18/content\\_2835563.htm](http://www.gov.cn/xinwen/2015-03/18/content_2835563.htm)。

域航空“三大交通网络”的倡议。而且，除了交通设施，在水电等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同样投入了人力和财力。整体而言，在非洲的基建投资方面，中国较日本占有绝对的优势和地位。根据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计算，日本与中国对非洲的贸易额在2000年均约为100亿美元左右，此后中国对非贸易额迅速扩大，至2014年已达2221亿美元左右，约为日本的八倍。近些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也是日本的七倍左右。<sup>①</sup>

基建的强大需求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发达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同样存在更新换代的需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和投入近几年才有大幅发展，所以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处于起步阶段。

在欧洲地区，德国铁路集团计划未来购买中国制造生产的列车和零部件，究其原因，除了中国长期高铁技术研发的成果，中国雄厚的外汇储备对出口的资金支持也成为有利因素。与此同时，日本日立公司同样希望能参与竞争，德铁集团已证实了日立也是其潜在供应商。在俄罗斯，2015年6月18日，中国中铁二院参与投标的俄罗斯首条高速铁路的规划设计合同顺利签约，成为中国高铁跨出境的第一单。因为中俄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攀升，铁路建设将加速两国的经济往来，并缩短两国的距离。2015年6月29日，李克强总理在中欧工商峰会上的演讲指明，中国愿意与欧洲投资计划对接，并在基础设施共建上有所突破，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积极参与投资总额为3150亿欧元的欧洲投资计划，以支持欧洲交通和能源网络等建设。<sup>②</sup>

## 二 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博弈背后的中日综合实力比较

亚投行的建立是以中国为核心，亚洲基建基金是以日本为核心，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能否建立和推进，主要依赖于这两个核心国的经济实力。无论是历史上的抗衡，还是目前基础设施投资的竞争，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要素都是中国和日本相互博弈的核心要素，这也是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具有可行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明辨日本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可

<sup>①</sup> 参见《日媒：日本能否扩大在非投资前景不明》，新浪财经，2015年5月30日，<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50530/211622307992.shtml>。

<sup>②</sup> 参见《李克强在中欧工商峰会上的演讲》，人民网，2015年6月30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630/c172467-27229235.html>。

以更好地比较和预见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未来发展及亚洲未来的权力分配。

### (一)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却依然保有实力

二战后,日本经济在经历短期快速恢复后保持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10%,70年代的年均增速高达7%,在80年代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年均4%的增速仍然十分突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泡沫经济逐步形成并放大,这主要缘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该协议致力于通过国际协作和干预措施,推动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兑美元汇率持续攀升,导致国际市场对日元连续追捧和对美元持续抛售,吸引了大量资金涌入获利空间较大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推动了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另一方面,日本是出口导向型国家,本币升值导致出口企业效益迅速下滑。为了刺激出口增长,日本不断下调利率以平衡企业的损失,并激励企业生产。利率水平的下滑使得融资成本下降,促使生产投资资金流入增加,助推资金投资规模扩大。

但是,这种经济膨胀并未长期存在。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开始破裂,经济增速连年下滑,股票市场震荡低迷,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下降,导致社会债务问题严重。因此,20世纪90年代成为日本“失去的十年”。进入21世纪,日本经济依然未从低迷状态中复苏,增长仍然乏力。由于日本与美国的经济交集密切,2008年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日本造成了重大冲击,使得本已低迷的经济再次陷入困境。日本采取了扩大公共支出、减税和发放消费补贴等诸多刺激措施,但成效不大。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方案,发放不设收入限额的“定额补贴”,总额达2万亿日元,并在2009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加大了“追加景气对策”的支持力度,首要的就是将保障国民生活作为重点,发行赤字国债。<sup>①</sup>虽然政府积极主动刺激经济,但是日本经济整体低迷,衰退特征无法消除。之后日本又遭遇大地震的巨大冲击,持续低迷的经济状况和日益弱化的企业竞争力,使得日本“失去的十年”延长为“失去的二十年”,甚至有人担心日本会进入“失去的三十年”。<sup>②</sup>

虽然近30年来日本经济未出现高速增长,但是日本经济总量依然居世界第三位,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9万亿美元,2013年和2014年

① 参见鲍显铭:《日本采取多项措施振兴经济发展》,《经济日报》2008年12月4日。

② 参见刘巍、蔡俏:《日本经济低迷的逻辑与前景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14年第1期。



虽降至 4.9 万亿美元,但主要是日元贬值所致。<sup>①</sup>而且,从人均 GDP 来看,2013 年达到 38644 美元,位居世界 20 名左右,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另一方面,日本拥有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先进的技术水平。在工业自动化方面,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机械设备生产国,在世界 500 强企业中占据较高的比例。因为日本一直倡导“技术立国”战略,对于技术研发的投入规模较大,技术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例一直处于 3% 以上,在发达国家中也处于高水平。这决定了日本在技术研发方面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并保有技术优势。

## (二) 中国经济腾飞并孕育国际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迅速崛起。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增长,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末,GDP 年均增长率几乎逼近 10%,部分年份甚至超过 10%。进入 21 世纪,从 2001 年至 2014 年,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9.4%,最高值达 11.9%,最低值也为 7.4%。即使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9 年中国 GDP 依然保持了 9.2% 的高增长。中国经济规模也因此一路攀升,在 2010 年成为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体,并一直保持至今。2014 年中国 GDP 总量突破 10 万亿美元,几乎是 2001 年的六倍,已经超过了日本一倍。经济增长提升了居民生活水平,2014 年中国的人均 GDP 是 2001 年的五倍多,北京、上海、天津等七个省市的人均 GDP 超过了 1 万美元。但是,就全国的人均 GDP 而言,中国的世界排名依然不高,位于 90 名左右。<sup>②</sup>

2005 年 7 月,中国开始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7 月 21 日即时调升人民币汇率 2.1%。其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攀升。到 2014 年,人民币汇率变动才出现了方向性改变,人民币中间价累计下降了 0.36%。但是,汇率变动并未影响中国净出口的持续攀升,同时助推了外汇储备的积累,中国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量最多的国家,2014 年底累计储备额超过了 3.8 万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进出口规模的扩张惠及周边国家的发展,强化了亚洲国家之间的关联,使得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2014 年 1~11 月,中国对东盟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432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8.4%,其中出口 243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7%,进口 189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对

①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 <http://data.worldbank.org/>。

② 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http://www.stats.gov.cn/tjsj/>。

韩国进出口总额为 264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6%，其中出口 91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8.3%，进口 173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sup>①</sup> 在现今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成为新兴经济体发展的主动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生产有了本质性的改善和提升，虽然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制造业企业规模偏小，但是逐渐缩小了差距。改革开放后，中国就强调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以及开拓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持续加强研发投资，2013 年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首次超过了 2%，达到了 2.08%，2014 年依然保持了较高比例，为 2.1%。高比例研发投入，为中国科研发展赶超发达国家奠定了资金基础，但是研发投入比例仍小于日本的比例。

### （三）中国和日本的国家权力角逐

德克·内伯斯（Dirk Nabers）认为涵盖财富、人口、经济增长、军事能力的物质能力是国家权力的资源，具有领导能力的国家能够通过分配公共和私有财产影响个体对世界的态度。<sup>②</sup> 区域领导型国家之所以能够产生国际影响力，是因为其自身各要素实力的提升。在经济总量、人力资源和军事能力等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双方各有优势突出，而实力优势的体现恰恰能够有效推动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建立和发展。

#### 1. 贸易方面

首先，在出口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凭借劳动力优势实现了出口大幅增长，进入 21 世纪，中国出口增长率在 2001 年至 2014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8%，只有 2009 年受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出现了负向增长。但是，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2012~2014 年的中国出口虽然仍然呈正向增长，但是增幅比之前有了大幅下降。反观日本，其出口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受经济下滑所拖累而增长不明显，甚至出现了负向增长。进入 21 世纪，从 2001 年至 2014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3.4%，且涨幅不稳定，2008 年和 2009 年都出现了负向增长，2009 年的负向增长幅度更是超过了 30%，直到 2013 年和 2014 年才逐步稳定。由于中国近些年出口的持续大幅增长，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计算，2014 年中国的出口规模是日本的三倍

<sup>①</sup> 参见中国商务部数据，<http://data.mofcom.gov.cn/>。

<sup>②</sup> Dirk Nabers, "China Japan and the Quest for the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67, 2008.

多。这说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实现了突破和提升，而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出现了下滑。

其次，在进口上，自2000年开始，中国国内经济对商品需求持续增长，进口增长率一直处于攀升状态，2001~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7.6%，只有2009年出现了负向增长，近两年虽然也有所增长，但是增幅处于低水平，2014年不足1%。日本的进口增长态势与中国类似，除了2009年外基本为正增长，2001年至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为6.4%。2014年，中国的进口总量是日本的两倍多，这说明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发展趋势较之日本更为强势。

整体而言，虽然日本在历史上曾在进出口方面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中国在产业结构调整 and 全面深化改革下迸发出来的贸易竞争力，目前中国在贸易领域已然占有相对优势。2015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14年贸易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连续第二年排名世界第一，第二名为美国，日本排名第四。

## 2. 投资领域

中国对外投资的历史要滞后于日本。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对外投资净额较低，1990年仅有9亿美元，90年代虽然有大幅增长，但是到2000年又降为10亿美元，其后虽然有所增长，但是直到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在世界中的比例仍然比较低。随后，中国对外投资出现了腾飞式发展，至2010年接近7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五大对外投资国；2013年首次突破了千亿美元的大关，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外投资一直保持着高水平和高规模，是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但是其国内对外部经济的接纳程度较为封闭，加之自然禀赋的限制、民族的单一性和社会结构的同质性，导致其他国家很难融入。因此，日本的对外投资一直远远超过对内投资，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二者的差距依然非常大。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资料显示，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对内对外投资比例高达1:18，虽然90年代末降为1:7，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近乎1:1的比例相比相差甚远。<sup>①</sup>这种不平衡使得原本低迷的经济状况呈现出设备过剩等问题。进入21世纪，日本不断改善对内投资环境，对内对外投资之比持续下降，2004年对内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对外投资。

① 総務省統計局、<http://www.stat.go.jp/data/>。

总之，虽然中国对外投资有了长足发展，但是日本在全球仍然占有绝对优势。中国的崛起只是导致日本在全球尤其是亚洲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改变。

### 3. 人力资源方面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2014 年日本新生儿仅有 100 多万人，比 2013 年减少了 9000 人。这不仅是日本新生儿人数连续第四年下降，也创下了历史新低。2014 年 4 月，日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 25%。新生儿数量的下降和老年人口的增加的双重制约，导致日本适龄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限制了生产和服务等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扩大，并加重了老龄化负担。<sup>①</sup> 而在中国，据国家统计局 2015 年 2 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有 1687 万婴儿出生，出生率达到 1.237%，高于 2013 年的 1.208%。2014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5.5%。<sup>②</sup> 虽然老龄化人口有所扩大，但是整体适龄劳动力规模仍然有所扩大，这为经济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 4. 军事方面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入了“全球火力指数”排名，通过分析和比较涵盖 50 多个维度的军事数据，如军事总预算、现有军事装备数量等，对 106 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实力进行了量化分析和比较，并列出了 35 强。其中，中国位列第三，仅位于美国和俄罗斯之后。日本虽然在军事方面投入较大，但是排名仅列第十。

### 5. 区域合作方面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两国在这一方面也存在竞争。以东盟为例，因为东盟占据着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要道，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重要的合作组织，这是任何要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的必争之地。长期以来，中日两国通过与东盟的不同合作方式相互牵制。早在 1991 年中国就与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并于 1996 年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2003 年，中国与东盟之间发展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国家。2010 年 1 月，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贸区。为了应对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日本 2002 年提出了与东盟建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并于 2003 年 10 月签署了《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

① 厚生労働省、<http://www.mhlw.go.jp/>。

② 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

协议》，与中国形成了区域影响的制衡。这意味着两国之间的国际举措相互竞争，同时存在制约。

在作为区域经济类合作组织的亚洲开发银行中，日本也占据绝对优势，投票权为 12.78%，中国虽然位列第三位，但是占比仅有 5.45%。这导致中国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受到限制，从而约束了经济影响力和自身利益的争取。

从上述中国和日本的国家实力分析可见，两国在经济规模、人均 GDP、贸易、投资、区域合作等方面各自拥有优势，日本在国际组织建立方面具有传统优势，中国经济的不断强大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也使其具备了建立和推进国际组织的实力，因此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都具有可行性。

### 三 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成本收益比较与制衡格局

在相互作用的外部环境下，中日两国在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博弈行为在考虑对方策略的基础上，选择各自的行为，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利益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因为盈利不是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建立的最终目的，其建立初衷是为了支持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进而扩大本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在共同支援的背后，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存在竞争，并同样面临局限性和困境。

#### （一）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成本收益分析

##### 1. 成本分析

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都直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二者的建立都离不开成本的支出。2015 年 6 月 29 日签署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为亚投行的正式成立奠定了法律基础，推动了亚投行的建立进程。而亚洲基建基金并不存在实质性推进，仅仅是一个意向。就目前的阶段而言，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成本主要体现在资金支出方面，而且即使后续的人员构成和办公场所建立等工作展开，资金投入也是前提基础，因此资金成本是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成本的核心内容。

资金成本支出离不开国家实力支撑，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总量都位于世界前列。并且，对亚洲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也是国家外汇储备的出路，因此雄厚的外汇储备是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资金支出的源泉。截至 2015 年 6 月底，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外汇储备为 3.69 万亿美元，日本财务省公布数据显示日本外汇储备余额为 1.24 万亿美元，这对于亚投行的法定资本 1000

亿美元和亚洲基建基金欲投入 1100 亿美元的资金成本支出都具备支撑作用。但是,就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规模和外汇储备实力而言,中国对亚投行的资金成本比例要小于日本对亚洲基建基金的资金成本比例。假设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法定资金都分别由中国和日本全资承担,以 2014 年 GDP 和 2015 年 6 月底外汇储备为例,则亚投行资金与中国 GDP 之比为 0.96%,与中国外汇储备之比为 2.71%,亚洲基建基金资金与日本 GDP 之比为 2.2%,与日本外汇储备之比为 8.87%。可见,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资金成本具有各自的资金支持,但是亚投行对于中国的资金成本压力远远小于亚洲基建基金对日本的资金成本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成本分担在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中差异显著。亚投行的建立是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强烈需求推动下建立的,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多国合作平台,通过亚投行这一平台,50 多个国家形成整体合力,共同承担资金支出,这将能够有效分担成本,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根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规定,中国认缴的份额在总额中占比为 30.34%,即使不是全额比例,按照现有各创始成员的认缴股本计算,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比重也达到了 26.06%,占有相当重要的话语权。而日本建立亚洲基建基金主要是针对中国国际举措的直接反应,并不是实际的需要。这导致日本欠缺详细的规划和主导明确的建设路径。就目前而言,日本提出的亚洲基建基金是单一国家行为,一国的独自推进导致亚洲基建基金的实施成本将完全由日本承担,无法有效分担成本支出。由此可见,在成本方面,亚投行通过规则制定,正逐步实现成本最小化,而亚洲基建基金对于单一国家而言成本支出较大。

## 2. 收益分析

虽然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较低,但是基建投资建设能否顺利实施和完成的关键,除了资金的支持,收益率也是必然考虑的要素。无论是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都显示,未来数年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非常大,达数千亿美元。因此,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针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存在较大的市场空间,蕴含着潜在获利能力。

中国和日本在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中对基建投资建设过程的推进策略和方法有所差别,导致吸引力和未来发展规模不同,也体现出投资项目的收益效果不同。如在交通运输设施方面的投资,中国在周边国家的投资不仅仅是国内铁路等技术和成本优势的延伸,而且是通过修建交通运输路线促成中

国和其他国家的联通，形成便利的交通网络，为未来的贸易交往奠定运输基础。这种建设思路在交通运输投资方面的获益时期虽然较长，但是能够有效带动沿途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推动进出口交易，由此获得较高收益。目前，亚投行的大部分成员国是以中国为起点建立的“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将加速各国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亚投行为“一带一路”助力的主要模式，二者形成了有效相互推动。相比之下，因为日本作为岛国的限制，无法通过交通运输建设将本国与其他国家相关联，所以虽然在基建方面可能有所获益，但是对于贸易改善程度的作用将比较有限。

亚投行创始国通过规则和制度的规定将各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的合力效益远远超过单一国家所创造的收益。发展中国家为了得到贷款，将提供本国的优势资源，因为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部分来源于国际组织的贷款，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贷款项目将成为各国投标方能否成功的重要资金支持。作为成员国为亚投行提供的便利条件和作为非成员国为亚洲基建基金提供的条件将呈现差异，前者将具有成本优势，由此提升利益空间。这对于单一国家构成的亚洲基建基金而言，收益领域受限。另一方面，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加入使得亚投行的运作机制能够借鉴发达国家在治理结构和运作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收益。当然，日本在国际组织建立方面具有一定的传统优势，因此也能够通过成本控制而实现收益。

除了经济收益，对于中国和日本而言，建立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主要收益是国际影响力扩大。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作为亚投行的倡导国，提出建立国际组织，旨在通过国际组织的构建塑造世界强国形象，并提升在亚洲和世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提升又反作用于亚投行，将提高亚投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重新塑造国际格局。对于日本而言，建立亚洲基建基金主要是担忧亚投行的影响力扩大而削弱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因此通过亚洲基建基金维持并扩大影响力也是亚洲基建基金的获益所在。

### 3. 亚洲基建基金的相对竞争优势

虽然与亚投行相比，日本构建的亚洲基建基金存在一定的不利条件，但是日本自身的传统优势使其具有不容忽视的实力。

首先，日本经济虽然增长速度缓慢，但是整体规模依然巨大，这为对外投资提供了资金前提。同时，日本的人均 GDP 远高于中国，民间资本较为雄厚，可以辅助政府投资项目。在部分对外投资项目中，日本政府出资比例较低，而民间资本成为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在 2013 年，日本提出在五年内对

非洲提供 20 亿美元援助资金时，采用的主要形式就是政府开发援助贷款和民间投资相结合的方式。2014 年日本海外净资产持续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为 366.9 万亿日元，日本连续 24 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这也成为日本对外投资的潜在资金支持。

其次，基建投资和建设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和支撑。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12~2013 年世界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表明，日本工业竞争力指数排名第一位。日本在精密零部件、高端装备等高新技术和高技术附加值领域占有显著的竞争优势，而中国的优势主要源自低廉的要素成本。日本很多地区形成了众多不同类型精密机械制造企业的聚集，在生产和制造方面形成了良好的协同合作，汇成了新产品研发和生产的优势所在。而且，日本视制造业为核心竞争力，2015 年 6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 2015 年版《制造业白皮书》，明确表示将继续推动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日本制造业优势竞争力为日本基建对外投资奠定了技术和制造基础。

最后，自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进入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并在 60 年代超过英、法、德等国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之为了融入国际社会，日本加紧进行对外援助。日本采用双边援助、技术合作、政府贷款等多种形式在亚洲、非洲等各大洲进行对外援助，2013 年 7 月 1 日《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海外援助投资急剧增加，2012 年 ODA 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投融资金额共约 5.73 万亿日元，达到了历史新高。<sup>①</sup> 这种形式也是亚洲基建基金资金来源和使用形式的主要方向，政府资金的不足将通过民间资金进行补充。因此，亚洲基建基金资金除了政府资金，还积极推动商业银行和企业参与到投资和建设，并借助于亚洲开发银行的金融支持。长期对外援助为日本积累了影响力和实践经验，成为其与中国开展基建投资竞争的优势。

可见，亚洲基建基金的优势和劣势相互交替存在，将借助传统优势与亚投行在基建投资和建设形成竞争，并借由基建领域的基础作用延伸到其他经济领域，重新塑造亚洲经济的相互竞争和制约格局。

## （二）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在制衡格局中的困境

### 1. 亚投行的局限性和困境

亚投行的建立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一股新兴力量，并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

<sup>①</sup> 『日本経済新聞』、<http://www.nikkei.com/>。



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资金来源，虽然前景和市场潜力广阔，但是前行过程中仍然存在局限性并面临着困境。

首先，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庞大，但是从未作为领导国独自建立和领导一个国际组织。以往中国只是作为成员国参与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而且在这些国际组织中，中国的投票权也未达到第一位。因此，在亚投行的推进过程中，面对组织结构、议事流程和规范以及资金运营和监管等诸多问题，中国都是首次尝试，没有积累的经验 and 现成的方法。而且，中国首次倡导建立亚投行这样的国际组织就吸引了 50 多个国家，如何平衡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和供给也是棘手的问题。因此，日后亚投行的发展将面临处理利益关系、磨合实施细节等诸多困难，这些困难不可避免又亟待解决。如果这些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将延缓亚投行的发展进程并减弱实施效果。

其次，作为主要创始国，中国具备独特的自身优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在金融领域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体系不够健全且金融市场不完善。而金融领域的发展水平有限会限制亚投行的资金运作，尤其是对于国际组织的领导国而言。中国虽然外汇储备雄厚，但是主要来源于已经开放的经常账户，而资本和金融账户并未完全开放且对外汇储备的贡献度不大。对于涉及其亚投行投资项目，中国资本项目的未开放将限制其运作。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使用范围依然无法与传统国际货币相比。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人民币国际市场份额占比通常在 2% 左右，而作为占比排名前两位的美元和欧元分别超过了 40% 和 30%，可见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空间很大。加之亚投行在业务运转过程中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将导致亚投行在计价、支付和结算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而面临潜在的金融风险。

最后，亚投行的建立昭示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这将导致国际社会中部分国家侧重于顾及“中国威胁”，日本建立亚洲基建基金就是这种现象的直接体现，这些顾虑将在亚投行的推进过程中造成阻碍。另一方面，亚洲部分国家虽然愿意接受来自亚投行的投资，但是同时仍然会顾及中国的影响，会在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争夺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寻求最有利于自身的优惠项目，这将影响亚投行的投资效益并减少投资项目数量。中日在泰国高铁项目的竞争，虽然不是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之间的竞争，但是其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部分国家的态度选择。

## 2. 亚洲基建基金的局限性和困境

中国的强大和日本的传统优势使得中日两国在国际层面一直处于动态的制衡过程，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对日本造成压力并倒逼日本采取应对措施，从而使日本在亚洲格局中面临困境。

为了与亚投行进行竞争，日本建立亚洲基建基金，计划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100 亿美元，这与日本目前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14 年日本的实际 GDP 下降了 1%。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中，居民消费需求依然乏力，个人消费降低了 3.1%；在投资方面，住宅投资减少幅度高达 11.6%，企业设备投资减少了 0.5%；在进出口方面，进出口总额下降了 2.8%，其中出口下降了 3.4%，导致贸易逆差持续扩大。<sup>①</sup> 日本国内资金的缺乏以及国外低息对抗式的竞争使得发行国债融通资金受到关注，由此造成日本国债的大规模发行，这也导致日本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明显增加。国家债务的风险和冲击程度影响一国的稳定发展，金融危机之后波及欧元区众多国家的欧债危机重创经济，就是很好的例证。日本是全球负债率最高的国家，负债率超过了 200%，这与其外部投资规模扩大形成了矛盾，导致日本陷入融资和投资的双重困境和恶性循环。在日本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对外竞争引致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支出，将对日本产生巨大的资金压力。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土狭窄，日本把出口视为战略重点，因此日本对外格局的整体部署与其出口导向息息相关。2014 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中国和韩国依然是日本最大的三个出口贸易国，日本对这三个国家的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了 40%。<sup>②</sup> 如此高的比例说明，上述国家对于日本的进出口状况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进口发生方向性改变，都将冲击日本的出口规模。韩国和中国、日本一样，都是亚洲国家中经济总量世界排名靠前的国家，虽然韩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及中国和日本，却是两国之间抗衡的重要砝码。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关系及稳定是地区架构的重要影响因素。2014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确定结束中韩自贸区实质性谈判；2015 年 2 月，中韩双方确定了协定内容，完成了自贸区的全部谈判；2015 年 6 月，中韩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韩自由贸易协定》，

<sup>①</sup> 《2014 年日本实质 GDP 下滑 1%》，人民网，2015 年 5 月 20 日，<http://japan.people.com.cn/n/2015/0520/c35463-27030943.html>。

<sup>②</sup> 総務省統計局、<http://www.stat.go.jp/data/nenkan/index1.htm>。

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超过税目的 90% 和贸易额的 85%，将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大幅度增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进一步提升。作为整体出现的中韩贸易体，将使得传统中日韩关系出现倾斜，东北亚地区主要的三个国家出现了格局重组，日本出口将受到制约。虽然中日韩三国也提出了自贸区倡议，并且在 2012 年宣布启动谈判，但是进展不快。日本对中国的针对性竞争博弈带来的结果是，对于日本而言，中日韩三国协定对其重要性不大，日本忌怕中国强大崛起的同时又寄希望于通过对抗和制衡影响中国，这导致日本陷入对抗中国、疏离韩国的与两个主要贸易国“不合作”的窘境。

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的经济强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中发挥优势能够产生数倍于独自行动的功效。日本针对亚投行而筹建亚洲基建基金，试图单纯依靠资金竞争，将使其步入狭窄循环空间，而不是良性循环。从日本针对中国的国际经济行为而被动采取各种措施看，为了在经济方面维持自身的地位、限制中国的扩展，日本受到中国对外政策部署的战略影响。而在军事方面，日本又受到美国海外部署的战略束缚，不断加大对军事的投入。这种双重牵制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形成掣肘，在其需要集中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时刻，却疲于对外部牵制做出反应、应对国际事务，导致资源分散化和资金离散化，不利于日本的经济的发展。

#### 四 中日竞争关系推进和重塑亚洲经济格局

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以及中国快速发展对日本国际地位的冲击，中日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诸多领域存在竞争，日本为了挽回和重塑国际影响力并对抗中国的崛起，根据中国举措而采取针对性行为，亚洲基建基金的建立就是例证。但是，竞争不是绝对的，因为中日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经济关联。2014 年 1 月至 11 月中国对日本进出口总额达 2850 亿美元，同比增长 0.4%，其中出口总额为 136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0.2%，进口总值为 148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0.5%。<sup>①</sup> 从 2006 年至 2014 年，日本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排名中一直居于前列，投资规模均超过 40 亿美元，2012 年和 2013 年甚至超过了 70 亿美元。两国在经济领域相互交织，形成了彼此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联网。所以，中日之间同样存在协作。协作和竞争不是完全隔离和界清的，

<sup>①</sup> 参见中国商务部数据，<http://www.mofcom.gov.cn/>。

二者互为前提，竞争促进发展，协作推动进步。协作和发展的同时并存是客观存在的，这使得中国和日本之间相互牵制和制衡，形成了博弈状态。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是在不同合作模式下权力与目标利益的竞争和制约，这种羁绊的根源是基于争取国际地位而形成的相互影响、牵制、制约和制衡。中日之间以经济往来为基础的牵制和以国际竞争为体现的对抗共同形成的制衡，不仅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基石，而且可以重塑多极化国家权力的亚洲格局。

### （一）亚投行的支点作用将撬动新型发展路径

中国要实现国际强国之路并获得权力和利益，不能仅仅依靠一己之力，而是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因为区域整合的核心目标是发展经济，所以以经济为导向的合作机制成为一国超越国家范畴并实现国际影响力的主要路径。在这个路径实现过程中，国家权力除了体现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及加入现存的区域和国际组织外，更为重要的是具备能够自行创立区域组织的能力并延续发展，通过政策和权力影响其他国家，并实现主导性影响。早期，中国通过最惠国待遇和债务减免等措施促进同其他国家的合作，但是通过制度性规则设定更能有效地形成团体力量，亚投行的建立符合了这一要求。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要选择，因为同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共同的发展需求，通过制度和规则将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紧密结合，形成超越国家能力的合力并提升共同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尤其是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告别了高速增长而处于调整状态，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营造国外良好的经济合作环境有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经济结构调整对中国的结构调整造成倒逼压力，对外加强合作并实施资本输出能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因此，建立以合作平台为主体的全方位主动对外开放体系成为必然。

在自行创立区域组织能力和延续发展方面，除了亚投行，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合作理念。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构成了支点与杠杆关系的立体投资和合作体系。亚投行通过资本投资形成有力支撑点，“一带一路”以亚投行支点为基础，覆盖成面，形成覆盖亚洲和欧洲区域的投资网络。在地缘政治利益和国际组织构成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的行为路径避免了与世界其他强国发生直接冲突。而且，以经济为基础逐步开展安全领域接触能够维护政权的外部环境稳定。

中国参与区域和国际组织的过程也是其国际政治权力提升的过程，不仅在经济上有所收获，而且在政治上体现了大国的实力。埃弗里·德斯坦（Avery Goldstein）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持续增强，将促使中国改变国际体系秩序，中国将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而是改变国际现状的国家。<sup>①</sup>戴维·康认为，中国在东亚呈现的是一种有别于历史格局的秩序，这种体系是稳定的，中国处于体系的核心地位，日本等国需要调整 and 适应。亚洲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扩展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亚洲是和平稳定的。<sup>②</sup>中国正在运用软实力驱动国家权力促使国际体系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并将逐步从经济层面覆盖至安全、科技等多层面。

## （二）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竞争博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关联度更加密切，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将无法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发展，由此导致经济依赖程度的提高。为了维持稳定的国际环境，各国之间的制衡更多的是通过制度进行。亚洲地区主要依靠市场导向和非正式的整合，通过区域组织的建立推动地区融合。因此，在东亚地区，相关制度安排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并且在制度和功能上产生重叠现象。<sup>③</sup>亚投行的成立，在相互错综关联的制度体系中成为新兴势力，改变了持续不变的亚洲格局。亚投行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中国拥有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覆盖全球的贸易影响力以及由此获得的“世界工厂”称号。而日本在科学技术水平和外部资金方面具有雄厚的实力。双方各自具备的实力，使得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竞争的侧重点不同，可以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异需求。

在基建领域中，若中国和日本进行合作，能够扩大投资范围，还可以通过利用对方的优势和异质性资源，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日本利用中国“世界工厂”的优势能够有效降低零部件等产品成本，在不同环节实现优化组合，扩大合作面。中国则可以借鉴和学习日本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研究方法，从而提高技术水平，继而提升整体的竞争水平。

<sup>①</sup>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up>②</sup> David C. Kang,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 - Pacif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63 - 89.

<sup>③</sup> T. J. Pempel, "Introduction: Emerging Webs of Regional Connectedness", T. J. Pempel eds,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 - 28.

中国和日本在亚洲地区的竞争和市场争夺产生了多重效应,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带动了地区经济增长,推动了亚洲整体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提高。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表现相当突出,但是基础设施的滞后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在 2010 年至 2020 年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将达 8 万亿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地区的基建贷款额度大概是 130 亿美元,远远低于目标值。<sup>①</sup> 亚投行的建立,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补给,亚洲基建基金的随之推出将资金支持再度提升,这抵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缺乏,并将强化国家之间的联系。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资金提供虽然小于亚洲整体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但是依然在投资项目上存在竞争,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实现需要多方因素的共同结合,因此在一定时期内项目数量处于一定范围内,最重要的是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投资覆盖面能够反映中日的不同影响作用,继而体现领导力的不同。日本设立亚洲基建基金的资金总量要超过亚投行,也是竞争的体现。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双重机制的良好竞争,也将为中日各自的发展带来新的投资项目和合作伙伴。日本应对亚投行而进行的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使得亚洲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多的资金选择和支持,二者的双重资金支持以及衍生的技术、管理等方面将形成国家发展的良性循环。

同时,亚投行的建立重塑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布局,促使其增加对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金额。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15 年 6 月 2 日报道称,在争夺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影响力方面,各开发银行正竞相做出总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承诺。<sup>②</sup> 在中国许诺帮助印尼建设高铁之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就表示也将向该国提供 110 亿美元贷款。过去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投向对亚洲的关注并不高,亚投行的建立促使金融组织向亚洲地区倾斜,补充了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的需要。可见,亚投行的建立成为有效激励,激励日本增加资金投放的同时,引导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流向,形成了多方协同博弈,共同推动亚洲的整体发展。

① 参见福蒙蒙:《十年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 8 万亿美元“亚太梦”下的中国机遇》,《华夏时报》2014 年 11 月 15 日。

② 《美日与中国抢着给亚洲搞基建》,参考消息网,2015 年 6 月 5 日,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5/0605/807045.shtml>。

### （三）中日经济博弈塑造亚洲新格局

在国际社会中，利益的不均衡导致各国关注的重点是相异的。虽然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建立初衷不同，但是中国和日本都将加强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这将形成有效制衡并实现多方利益，发展中国家也能借此机会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并借助不同机构之间的制约和竞争而获得较为有利的投资条件。

由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亚洲各国之间存在人权、领土等诸多较为敏感的问题，中国和日本也不例外。即使各国在其他领域存在争议，但是在经济领域更多的体现为贸易往来和投资建设。在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利益驱动下，各国出于主动或被动因素而摒弃相互抵触和矛盾，通过经济纽带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不断加深融合。在融合过程中，各国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网络形成有效的牵制，使得各国有意避免矛盾和争议，也规避了较敏感领域问题的激化，甚至可以在交涉过程中渐进式调和。中国的崛起，改变了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强势，突破了日本依靠经济优势在亚洲建立的经济阶梯，并冲击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国要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日本要维持传统的领导优势，两国在诸多领域存在竞争，但是在贸易和投资等经济领域交往日趋密切的条件下，经济的牵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领域矛盾的激化。中国突破日本经济优势所形成的亚洲领先地位，在经济领域不断拓展，形成了双方之间的相互制衡，这种制衡将在国际层面避免一国优势的垄断，从而避免霸权主义的产生和影响。

亚投行和亚洲基建基金的建设只是中日两国基础设施建设竞争的一个侧面，在经济领域并延伸至科技等领域相互牵制和竞争所形成的博弈制衡将长期存在，并因为两国的强大经济背景而重新塑造亚洲未来的发展格局。当这种竞争博弈表现为良性有效竞争时，有利于亚洲国家的整体发展。中国应在现有国际和区域组织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方面加强和深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合作和协商，在重叠利益区间逐步有序扩大经济和政策战略的影响力，最终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格局。

## The Economic Game and Balance of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Patter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Zhang Ailian and Liu Bai

In 2014, AIIB was established by 21 founding members. After several months,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Fund. In the area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Asia, China and Japan again start a competition game,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will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t will be not beneficial for Japan to rely on its own capital for competing with AIIB, which may lead to a dilemma rather than forming a virtuous circle. Meanwhile, Japan's not participating in AIIB means a loss of trade opportunities. Both as leading economic powers in Asia, China and Japan may produce several times of economic benefit when they focus on their own primary field than acting in an all-round wa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may produce a balance through complex networks of economic interests avoiding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ensitive issues as well as the monopoly of one n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t is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sian pattern conforming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 アジアインフラ投資における中日間の競争とバランス 張 艾蓮 劉 柏

2014年、21カ国が、アジアインフラ投資銀行（AIIB）の設立を決定した。その数ヶ月に、安倍総理大臣がアジアインフラ基金を設立すると発表した。したがって、中国と日本がアジアを舞台にインフラ面でせめぎ合いを展開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れらの組織はいずれも、地域経済の発展に資金を提供して成長を進めていくものである。日本は経済力に頼って競争をしようとしても動きはままならず、逆に閉ざされた世界に陥り、かつAIIBへの参加を見送ったことからビジネスチャンスも逃してしまう。アジアの経済大国として、中日両国はそれぞれの得意分野で優位性を発揮すれば、相乗効果を生むことになる。多国間のインフラ投資により、からみあう経済的利益のネットワークにある程度の抑えがかかる。こうしたバランスにより特定の国の独占状態が回避され、途上国にプラスになるようなアジアの枠組みが構築されてゆく。

（责任编辑：叶琳）